

海洋经济研究丛书 |

Impa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on
Fisheries and Seafood Quality and Safety

产业组织模式

对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研究

高小玲/著



科学出版社

海洋经济研究丛书

**Impa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on
Fisheries and Seafood Quality and Safety**

**产业组织模式对水海产品
质量安全的影响研究**

高小玲 著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69210560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085 项目(项目编号:B5008130101) 资助出版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养殖类大宗水海产品主产区与专业批发市场,运用多案例质性研究、问卷调查、上市公司经验分析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凝练苏、闽、沪等水海产品典型产业组织模式,且对比分析各类模式在生产流通主体分工、纵向关系格局、利益联结机制、激励约束策略、政府角色特征维度及其质量安全状态的差异,同时解读产业自强化机制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机理及其与公共规制力量的耦合,实证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各要素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程度与作用层面,并基于此提出食品质量安全的“全产业链”治理机制。

本书适合食品质量安全领域学者、产业管理部门与政策制定者参考借鉴,也适合水海产品养殖者、加工企业、经销商、专业市场经营管理者等用于指导实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产业组织模式对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研究/高小玲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海洋经济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39452-1

I. ①产… II. ①高… III. ①产业组织-影响-水产品-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研究 ②产业组织-影响-海产品-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研究 IV. ①TS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1381 号

责任编辑:魏如萍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阎磊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字数:289 000

定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海洋经济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编 潘迎捷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晓慧	李欣	李国军	杨昕
何广顺	沈君	沈依云	张效莉
金左文	周剑	宗传宏	顾湘
高健	高小玲	郭倩	黄硕琳
谢童伟	管红波	潘迎捷	

总 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的压力与日俱增，人类已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向资源丰富、广袤无垠的海洋，未来，海洋必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战场之一。因此，沿海各国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强国作为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战略。海洋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发展模式实现由依靠陆域发展向陆海联动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全球呈现出陆海一体化开发大趋势，蓝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接替区。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人们既享受着经济发展的种种实惠，也承受着经济粗放增长的种种代价，如城乡二元结构、环境污染等。面对发展战略的转移，区域发展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取向，由高消耗的外延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增长转变，由追求经济量的扩张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关键时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放进入更高平台。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并不牢固，一些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改革到了攻克最顽固堡垒的时期，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等均处于攻坚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再加上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由快速上升通道进入调整期，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有所改变，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地位将极大提升，全球经济格局随之产生变化。这要求我国在后危机时代，不断加深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和影响，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经济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布局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经济发展总体上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海洋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更加突出。2012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 5 万亿元，维持了近 8% 的增长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6%，海洋经济劳动生产率水平始终维持在全国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 2~3 倍。综览我国现有海洋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存在以下特点：①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方式

进一步向集约化过渡。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深圳经济特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成的沿海经济区域布局基本成形,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7.1%。②海洋经济核心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成为拉动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区,三大海(群)岛资源已进入重点开发阶段。③我国传统海洋产业拥有全球比较优势,新兴海洋产业逐渐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生产、船舶制造能力均跨入大国行列,对海洋经济贡献居前,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业、邮轮游艇、海洋文化、涉海金融及航运服务业等一批新兴行业也已快速起步,海洋产业格局中新兴产业逐渐代替传统产业占据较大比重。④我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海洋生物研发、环境监测、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深海探测等方面实现关键性突破,这些均将促成以高新技术为引擎的海洋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

蓝色海洋蕴含无限商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海洋经济还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面临海洋资源退化与深度开发乏力、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科技人才缺乏、临海产业腹地发展空间与环境容量制约、海洋综合管理部门薄弱、管理主体之间权限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另外,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的刚性作用引致海洋经济地域分化格局依然显著、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海洋产业布局缺乏系统性也引发用海产业冲突加剧与海域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拥有良好的海洋资源禀赋、海洋经济规模大、产业组织化程度高的地区面临海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诸多种种均对我国海洋产业发展软环境提出了迫切要求。

我国海洋经济开发中面临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海洋科学技术与主流国家的技术和研发源、世界科创中心相隔离,我国在海洋工程、技术技能和研发上相对落后,国内海洋相关产业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还很稚嫩,现阶段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偏低。同时我国海洋科技成果主要应用于四大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新兴海洋产业领域应用甚少,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因此缺乏新兴产业的带动。伴随我国海洋经济快速成长的上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需要学术界、实业界与政府部门共同努力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为此,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共同组织年轻的学者们著述编撰了这套海洋经济研究丛书。这套丛书面向我国海洋经济开发利用实践,直面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内容涵括海洋经济开发机制、海洋产业发展模式、海洋经济圈建设方略、海洋产业带管理、海洋经济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演

变、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海陆联动、国际海洋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海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海洋产业区域竞争力、水海产品精深加工、水海产品质量安全、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修复等。本丛书旨在探讨海洋经济开发过程中需要重点突破的命题以及整体推进的路径和模式，为海洋产业主体参与全球竞争提供系统化理论借鉴，为海洋产业实现理性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为科学确定新时期国家海洋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和实施重点提供经验证据，从而促成中国海洋经济领域实现快速健康发展、释放助推抢占制高点的能量、走上创新驱动与内生增长轨道。

潘迎捷

2013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食品质量安全实践体系面临的新挑战	1
1.2 食品质量安全领域的理论阵营与现有理论困境	2
1.3 本书的分析框架与内容安排	5
1.4 本书的分析方法与维度	8
第 2 章 食品质量安全的动力机制与治理理论	11
2.1 食品质量安全动力：公共规制与市场驱力的双重效应	11
2.2 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诱发源及其关系机理	12
2.3 食品质量安全外部治理模式及理论困境	17
2.4 食品质量安全治理：产业组织模式的新视角	21
2.5 现有食品质量安全治理理论的解释力及其演进趋势	24
第 3 章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机理理论框架	28
3.1 约束质量安全中产业内横纵向关系替代政府规制的理论逻辑	28
3.2 约束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主流产业组织模式是纵向一体化或合作社	30
3.3 产业链纵向关系对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机理	32
3.4 政府规制对产业内横纵向关系约束质量安全的补充效应	37
3.5 食品生产经营者特性、产业属性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38
3.6 产业组织模式对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机理整合框架	39
第 4 章 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多案例分析与量化实证的融合	41
4.1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多案例质性分析架构	41
4.2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实证分析架构及概念界定	45
第 5 章 我国水海产品生产流通组织模式及产品质量状态评估：多案例研究	55
5.1 南通条斑紫菜生产流通模式及其产品质量评估	56
5.2 宁德养殖大黄鱼生产流通模式及其产品质量状态评估	64
5.3 奉贤南美白对虾养殖流通模式及其产品质量安全评估	68
5.4 水产品专业市场运营模式及其产品质量安全评估	73

5.5	典型水海产品产业组织模式与产品质量安全关系解读·····	78
5.6	多案例质性分析结果讨论·····	83
第6章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实证研究·····	85
6.1	纵向一体化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基于食品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85
6.2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实证研究结果·····	88
6.3	产业组织模式对水海产品质量安全影响的假设检验小结·····	157
第7章	结论与食品质量安全“全产业链”治理机制·····	159
7.1	质性研究结论——水海产品典型产业组织模式运作机理与质量安全 ·····	159
7.2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分析与实证结果·····	161
7.3	食品质量安全的“全产业链”治理机制——基于水产品的实证·····	171
参考文献	·····	181
附录	·····	194
附录1	水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调研提纲·····	194
附录2	水产品市场流通经营调查问卷·····	195
附录3	水产养殖区核心企业调查问卷·····	202
附录4	水产品养殖户生产现状与产销对接模式调查问卷·····	210
后记	·····	219

第1章 导 论

1.1 食品质量安全实践体系面临的新挑战

食品安全事件的相继曝出使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事件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对公共规制公信力的质疑，摧毁了公众对食品供给的信心；另一方面，事件也使诸多食品企业在世界市场的声誉受损，对企业与产业造成毁灭性灾害。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与动态化、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快速的产品与过程创新以及国内贸易的不断拓展致使各国食品安全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在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数情形下确保食品安全的责任落在政府肩上，食品安全作为公共政策的主命题，政府对其规制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强化食品安全共同标准；二是加强公众参与、消费者教育，以及提供透明化信息给消费者，如标签制度，促成消费者形成食品安全的自我判断意愿与能力。在中国，消费者目前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热情创历史新高（Ortega et al., 2011），政府通过颁布严厉的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设立并强制推行国家标准与认证系统等来获取食品安全，2009年6月1日中国新食品安全法规正式生效，取代了先前的食品卫生法规。

农业综合经营中质量安全概念的独特性在于其受所有市场博弈者的共同影响，高质安全食品供给或者质量差异化要求农业与食品生产组织的变革，尤其是价值链治理结构变革（Grunert, 2005）。任何时候质量安全问题都不可能在终端加工层面解答，而是需要渗透到整个价值链，价值链成员间的关系也必定随之改变。尽管市场已经清晰地展现出食品质量安全日益差异化，但食品安全供给的复杂性和挑战不仅在消费需求方——消费者想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质量以及消费者决策过程的错综复杂，还来自于生产者。生产者必须感知和解释消费者发出的信号并将差异化产品推向市场等待消费者反应，且面临新产品高失败率的风险。

传统意义上食品生产差异化主要发生在加工层面，然而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动植物养殖生产的差异化开创了新的可能；同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与日俱增、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质促使“全产业链”食品安全整合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强调产业链上所有参加者的食品安全基本责任，单个产业链参与者也逐渐寻求上游产业链参与者提供的产品安全性保障（Valeeva et al., 2005）。这一趋势意味着种养殖层面的差异化与食品安全被认为是影响终端消费产品质量与安全的重要因素，消费者需求回溯到基础生产的差异化有效地维持了生产者的竞争优

势。但相对于种养殖层面产出仅仅由价格和同质性来评估的情形，这尤其需要价值链成员间更加密切地合作，尤其是发展农户与加工商之间契约安排的新形式正是食品安全领域研究的核心所在（Boger, 2001；Bogetoft and Olesen, 2002）。

中国目前正经历快速城镇化，拥有大量媒介的新型食品市场化网络正在形成，传统的食品交易治理机制正在瓦解，超级终端与加工厂迅速壮大且其物质设备精良堪比发达国家，但是这些企业的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质量参差不齐的小型、分散经营的农户，或者无数活跃在乡镇的小中间商、贸易商、零售商或者代理商构成的扩散网络——利用手机联络方式与批发市场来聚集来自偏远山村的货物，并将其运往产品市场或超市。因此整合大型企业 with 大量小规模农户或小经营者仍将是食品安全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食品安全不只是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组织革新在确保食品安全中的作用在以往实践中被忽视而未能得以开展，这些更加重了中国食品质量安全体系改革的负担。

1.2 食品质量安全领域的理论阵营与现有理论困境

相应地，学术界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集中于三个领域——消费者质量安全需求、消费者质量安全感知、质量安全标准与法规（Grunert, 2005）。

消费者质量安全需求领域研究质量或安全特性的增强反映消费者偏好的程度水平及其对消费者附加质量的支付意愿的影响。衡量消费者支付质量安全属性的意愿已经成为农业经济领域的一个研究主流：在消费者需求与相应价格等市场交易数据可获得的情形下，现有研究者普遍采用享乐主义的定价理论（Steiner, 2004）、混合多项逻辑理论（Bonnet and Simioni, 2001）等方法评估消费者支付意愿；而在产品尚未上市或者无法获取实际产生的需求数据的情形下，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试验竞卖、混合关联分析则是最普遍使用的评估方法。

消费者质量安全感知领域研究消费者感知质量安全的过程以及感知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机理。当今大量的农业经营实体之间不仅仅是效率与质量控制的竞争，更是价值增值竞争——食品价值增值到一定水平且能使目标消费终端体验到这些产品质量更高。消费者质量安全感知是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媒介，与产品供给方互动中形成的消费者偏好不仅仅具有需求层面的意义，更是引导了需求。质量概念包含客观与主观维度，客观维度的质量指产品的物理属性，主观维度的质量指消费者感知的质量，只有在生产者能将消费者期望转化成产品物质属性、消费者能从产品的生产方式中判断产品质量时，食品质量才成为食品生产者的竞争力要素。同样，主观维度的食品安全存在于消费者的信念中，由于现今教育消费者成为业余食品专家的尝试失败，增强消费者风险与安全意识的必要性就被提上了解决质量安全问题的议事日程。尤其在食品恐慌情形下风险感知将成为食品选择的主导因素，自 Slovic（1987）开始，学者们对消费者风险感知进行了广泛研究。

研究发现对于消费者而言,自我施加的风险比基于技术的风险更能接受;当新技术和不为人知的技术被应用时,消费者感知风险被放大;不确定风险比确定性风险更危险。供应链每个环节采购商或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的强化给产业带来了创新压力(Hooker et al., 1999)。

质量标准与法规领域主要研究公共食品安全法规与私人标准对食品安全供给的影响。公共食品安全标准通过立法强制执行,促进食品安全供给的立法涵括与最终产品特征相关的标准(如最高残留物水平)、食品产业链的生产实践、产业链的可追溯性、供应链的法律责任,市场失败风险促使公共标准成为保证终端市场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公共规制改革,近年来内含纵向整合与水平整合的供应链共同私人标准的应用与日俱增,私人标准包括基础设施、设备、生产模式、加工过程与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通常比法律条文要求更严格。在国际贸易背景下,有关质量标准与法规的讨论更多聚焦于标准的合法性与协调性(Frahan and Vancauteran, 2006),甚至涉及“标准”何种程度上发挥了贸易壁垒的功能(Garella, 2006; Hammoudi et al., 2009)。而且现有研究无论是针对公共规制还是私人标准的影响分析,基本集中于两个视角——公共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社会满意的食品质量水平)与产业经济学(成本效率与竞争)。

鉴于农产品供应链的市场失效风险,中国学者与政府也开始关注研究组织经济学领域的运输成本、代理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推进纵向合作组织形式以确保食品安全与质量(Zhang and Aramyan, 2009),很多大企业通过租赁连片土地、雇佣当地农民实施了纵向一体化,但耕地本身的分散化与集体所有制使得这种制度安排难以实施或者实施成本很高,松散的“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在实践中更为普遍。Starbird 和 Amanor-Boadu (2007) 研究显示,产业内的垂直整合是保持产品可追溯性与确保最终产品满足期望标准所必需的。但政府与行业领导型企业组织化农产品供应链的努力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农产品生产与分销仍然高度分散化、合作与质量安全监管仍然不到位。

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提高行业进入门槛来保护大型食品安全供给者,例如,在生猪加工行业,政府在补贴大企业的同时关闭小型屠宰场;在乳品行业,2011年政府通过重新颁发执照实质上关闭了45%的乳制品小型生产企业,2014年政府或将出台的乳品行业兼并重组细则将进一步增大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产业集中度,以实现乳制品的安全高质供给。另外,政府也定期采取行动鼓励农户组建生产者协会或生产基地以产生生产养殖协同效应。实现规模经济以降低每单位日常管理成本是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的题中之义(Gale and Hu, 2011),但这种以行政方式引导纯市场行为的价值与风险目前尚不明确。尽管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规范条例得到强力推行,但公众也越来越意识到食品供应商具有更为广泛的执行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动机。

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与媒体(刘东和贾愚,2010;杨伟民和胡定寰,2010;刘畅等,2011;华红娟和常向阳,2011;肖兴志和王雅洁,2011;钟真和孔祥智,2012)也纷纷探寻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业组织根源,他们普遍认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与当前食品生产流通组织化程度低有较大关系,并且提出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本是转变食品产业发展方式,关键是形成产业链内部的安全隔离机制,同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型连锁超市、大型加工及贸易企业直接与农户对接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奶农-企业利润分成模式”、乳业加工企业自建大型牧场将极大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一些国外学者(Raynaud et al., 2009; Allaire, 2010; Giraud-Heraud et al., 2012; Fałkowski, 2012)也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模式应从市场型的管控转向混合模式甚至是纵向一体化,食品价值链上上游原料提供者是最终产品质量的关键,而且尽管食品价值链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从事食品安全控制,但大企业和最有组织的经济主体——合作社和混合生产网络等起着主导作用,实施私人标准是确保企业尽责预防食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品牌商(零售商)通过与农户或家庭作坊订立正式契约来为其提供关键投入要素和服务,从而获得农户等的承诺与质量保证。现有文献与各国食品产业实践似乎显示,“食品产业整合尤其是纵向一体化”是目前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的最佳路径。

然而目前,我国研究食品安全压力下的供应链水平整合与纵向整合问题的学者,大部分集中于是否加入供应链组织、供应链组织类型对原子式经营主体食品质量安全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至于“产业整合的载体类型、运作机理履约机制为何,产业链上各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讨价还价能力变化趋势及其对食品质量的调控机理与作用层面,纵向一体化核心企业的激励约束策略、产业链共同私人标准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私人标准对市场的影响程度及其供应链重组问题等”未来解决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主题则甚少涉及;大部分论证了食品质量安全实践偏好与生产经营者特性存在系统性关系,但缺乏对一组复杂的企业特性组合影响经营者质量安全生产流通行为机理、该组合中哪些要素在不成熟市场环境下对经营者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影响更突出的研究。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依赖于博弈论与理论推导方法,难以获取充分信息以提炼垂直合作不同模式特性,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因此受局限。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基于欧美成熟市场总结的经验,如“纵向交易通过正式契约协议来治理能更好平衡原子式经营主体利益与食品安全目标”等是否适用于处于新兴市场的中国食品行业还有待验证。而且现有食品安全的公共政策通常假定就提高日常决策与应对质量危机而言信息越多越好,但实证研究却显示更多信息不仅不会带来高效率,反而会增加误解和消费者恐慌(Grunert, 2005)。

显然,基于我国食品行业实践突破现有研究局限、解读以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为以最低市场扭曲来实现预期的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新路径,研究结果有望更好地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高质安全产品的足够激励资源并为建构长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提供决策线索。

1.3 本书的分析框架与内容安排

1.3.1 研究思路与分析脉络

目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治理主要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表现为政府加大对企业或经营者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然而我国农业经济中的现实是主流的“农户小规模分散养殖与布点收购分散的生产交易模式”短期难以改变,这种现实决定了食品生产质量信息的搜寻成本高昂、政府规制者缺乏获取供应链质量信息的激励,导致政府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有效介入和控制食品质量生产流通过程,法规对于小企业或生产者效果甚微;与此同时,公共规制作为强制固定成本支出,由于缺乏弹性也给小型经营者带来了成本劣势并阻碍了创新进程,这意味着政府缺乏直接干预监管市场中企业或生产者行为的权力与资源,“大市场”与“弱监管”使中国食品市场质量安全堪忧。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SCP) 范式,在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 (C) 产出社会绩效 (P) 失灵的情形下,一种替代政府高压激励约束的方案是政府通过诸如推出指导价格等产业政策影响食品行业产业内纵向关系模式 (S),进而利用产业市场势力 (存在需求质量弹性) 来进行市场中企业或生产者行为修正,基于市场的政策或机制比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在解决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效力可能更大,因此食品质量安全治理中需要研究产业市场驱力在政府政策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中的效应,甚至是产业内关系约束直接作用于质量安全行为的路径与层面。

食品供应链产业私人标准与供应商协议则整合了食品安全、环境与社会因素,展示出产业共同承担供应链食品安全责任的集体理性,弥补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规制缺位,也使得公司或行业产品更具竞争力。供应链质量安全产品供给失败的风险通常内生于上游生产者与零售商的垂直关系模式,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①农产品尤其是水海产品具有地点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等特点;②食品行业无论是资本投入还是竞争压力和风险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根据奈特的观点,专用性交易中随着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大,交易双方必须设计某种机制来解决问题,长期契约或是纵向一体化的内部组织成为这类机制形式,前者属于纵向分离中的准一体化模式,后者是基于产权关系的实体整合。这一理论逻辑是否反映了水产品行业的现实还需要验证,因此本书需要实证研究“产业内纵向整合是否有助于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果这种作用存在,那么

纵向一体化的不同载体类型对于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效用以及调控层面是否存在差异?是怎样的利益联结机制使这些纵向一体化模式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与存续?”等。

同时食品质量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与质量信息的复杂和高度不对称特征导致“搭便车”行为增加,这决定了仅用基于市场动力的产业自组织机制无法供给最适宜的安全食品,因而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纯粹市场约束产生法律效力对于实现产业链间共同私人标准是必需的,终端市场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不仅依赖于共同私人标准的水平,也受制于同盟执行共同私人标准的规模(Giraud-Heraud et al., 2012)。在给定价格和消费者质量敏感性的情形下,市场供给的均衡质量依赖于供给者是利用“开环”还是“闭环”战略,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影响供给者面临的战略情境(Brekke et al., 2012)。因此,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构建中政府主体不能缺位,实践中政府也应尝试通过推进“农业合作社”“兼并收购提高行业集中度”模式来解决引致“败德行为”的我国农户生产规模问题。

因此公共规制与产业共同私人准则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与最终产品市场质量安全程度密切相关,这一关系尤其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环境下与国际贸易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公共规制和产业共同私人标准影响企业内部组织形式、战略行为以及产业链组织模式,确保遵守公共法规并避免潜在的负面需求效应要求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产业内的垂直整合是保持可追溯性与确保最终产品满足期望标准所必需的。因此,利用产业内纵向关系影响生产者行为最终影响市场绩效的产业自组织规律可能是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新思路,且其中政府制度安排对于产业链共同私人标准的水平设定、实施规模影响明显。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者,确保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最低的产品标准是什么,而是运用何种工具实现质量标准。

另外政府现有惩罚成本只关注核心企业(或品牌商),而未考虑核心企业把部分成本转嫁给上游生产者的影响,因此需要研究更普遍的上游生产者成本结构等经营者特性、惩罚成本的函数形式与上游生产者生产质量安全产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而且食品市场价格或产出具有不稳定性,需求方具有不完全信息,同时消费者受消费习惯以及对供应商信任程度的影响,其行为具强黏连性,因此消费者对质量反应具有滞后性,政府则可以利用资源公示食品供给者的质量参数指标从而影响消费者质量反应滞后性,消费者质量反应越灵敏,稳定状态的最佳价格越低,食品质量安全的需求方主要依靠政府治理。本书非常有必要考察“何种类型的政府信息传导扩散机制、媒体传播”会对消费者质量差异敏感度产生影响。

为了验证上述关系与解答上述问题并形成食品质量安全“全产业链”治理机

制,我们选定食品行业核心企业的典型代表——上市公司,并进一步选取具高质量安全风险三类大宗水海产品行业^①进行研究,研究我国新兴市场环境下食品质量安全与产业组织模式、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产业市场权力与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机理及其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并最终提出食品质量安全的“全产业链”治理机制。

1.3.2 本书的结构及内容安排

本书基于产业价值链治理结构,融合公共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产业经济学两个视角来研究产业纵向关系模式与政府行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考察产业自强化机制与公共规制力量的互动机理及其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提出食品质量安全“全产业链”治理机制,试图通过解构产业链纵向关系以破解食品安全困境。本书各章节框架及具体内容安排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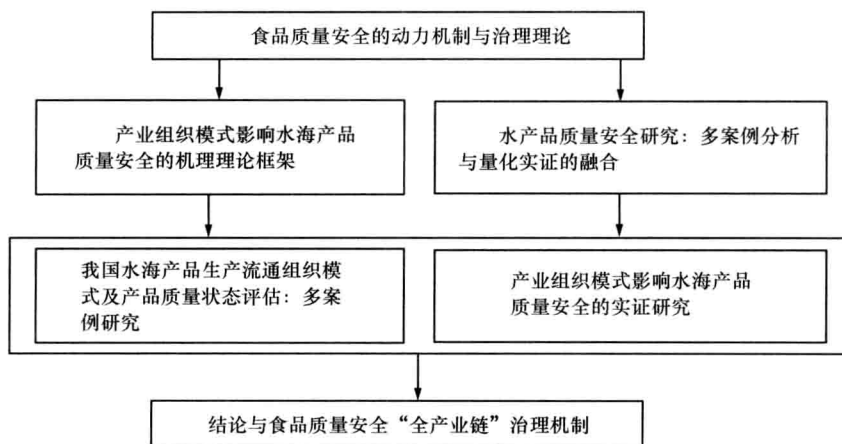


图 1-1 本书的内容框架

第2章为食品质量安全的动力机制与治理理论。该章归纳总结了食品质量安全的动力源、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诱发源及其关系机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内外部治理机制。剖析了食品质量安全的市场驱动力与政府规制动力机制及其特性,解析了政府监管政策、食品领域产业市场格局、产业内共同私人标准、企业属性、消费者需求偏好与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关系机理,从政府角色定位、食品质量安全信号传播机制、消费者食品质量安全意识提升、食品质量安全产业链关键控制

^①目前国内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样本主要聚焦于奶业、猪肉、蔬菜等行业,对合作社、订单农业(生产合同)等纵向协作方式对生猪行业、肉鸡行业质量安全控制的影响,对于同具有高质量安全风险的水产品行业则鲜少涉及,对水产行业质量安全控制可能呈现新特性或会有新发现,如是可进一步丰富食品质量安全理论。

点体系角度梳理了食品质量安全外部治理理论,从产业整合治理、经营主体质量安全生产能力与认知、产业私人准则与公共规制的混合治理三方面对食品质量安全产业内部治理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分析了食品质量安全治理理论的演化趋势。

第3章为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机理理论框架。该章在现有食品质量安全治理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成果已十分丰富的买供间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并综合考虑水产品行业的特点,从理论层面解读水产品行业产业内横纵向关系与政府激励约束对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逻辑、产业内不同利益联结机制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命题。

第4章为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多案例分析与量化实证的融合。该章详述了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多案例质性研究方法与设计以及定量实证研究设计与方法。具体说明了案例样本选择依据,数据收集方法,资料处理方法,实证研究的命题,测量工具的发展,核心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以及信度、效度分析与多元共线性检验方法。

第5章为我国水海产品生产流通组织模式及产品质量状态评估:多案例研究。该章具体研究南通老坝港紫菜、宁德养殖大黄鱼、奉贤南美白对虾与上海专业批发产品市场在水产品信息、关系导向、权力结构、产销利益连接、知识技术转移与激励约束机制、政府角色定位、产品质量安全稳定性等方面的特征,对四类典型产业组织模式进行了分类与归纳,并评估了其质量安全状态,分析了生产流通组织模式与水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

第6章为产业组织模式影响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的实证研究。该章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食品行业上市公司二手数据,对流通领域专业批发市场商户 176 份问卷数据、主产区核心企业 39 份问卷数据、主产区养殖户 102 份问卷数据进行了项目分析、信度与效度分析、变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交互效应分析与多元共线性检验。该章还对研究命题与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总结。

第7章为结论与食品质量安全“全产业链”治理机制。该章对多案例质性研究、经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尤其对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归纳,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

1.4 本书的分析方法与维度

1.4.1 本书的技术脉络与研究方法

(1) 本书在梳理文献、搜集食品行业与上市公司资料及数据的基础上,综述食品质量安全治理研究,剖析产业内横纵向关系及其互动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